

院情简报

GIIS NEWSLETTER

 GIIS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第2期

2017年3月·总第二期

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
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
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

“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
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方理事单位
广东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11月13日,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科研与教学资源为基础的智库,专注于广东国际化战略理论、实践与政策等问题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决策支持,是“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外交部人才培养基地、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金砖国家智库联盟理事单位、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广东省委组织部人才培训基地、广东省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标是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校特色新型智库。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聚焦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周边战略、全球价值链等国际战略问题,承担了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以及省自科团队项目等省部级研究项目70余项;完成各类政府决策咨询研究报告近150份,获得各类批示90多份,其中被政治局委员批示10份;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社科联成立50周年优秀决策咨询成果奖、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优秀课题组年度课题奖、广东省工人先锋号等20余项各级别的奖励。在决策咨询、国际合作和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广东社会经济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目 录

Content

一、新闻资讯.....	1
二、学术动态.....	10
三、社会回音.....	43
四、外出交流.....	47
五、成果发布.....	50

一、新闻资讯

重大新闻

我院参加外交部课题签约仪式

3月8日，我院参加2017年外交部重大外交政策研究年度课题签约仪式。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代表外交部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多家合作单位颁发合同。



郑泽光副部长颁发合同

海丝中心召开 2017 年核心协同单位副理事长会议

2017 年 2 月 19 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在厦门大学召开 2017 年第一次核心协同单位副理事长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心人才培养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讨论并部署中心 2017 年重大工作事项。会议由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主持。



2017 年第一次核心协同单位副理事长会议

中心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简称世经所）所长张宇燕，中心副理事长、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建发，中心副理事长、管委会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简称商务部研究院）处长安宁以及各核心协同单位相关工作负责人、联络员出席会议。



隋广军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海丝中心商务部研究院副理事长、副主任人选更迭事宜，聘任商务部研究院张威副院长担任中心副理事长、副主任；审议通过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协同单位协同合作暂行办法、人才协同培养与管理暂行办法、重大决策咨询报告协同创新暂行办法等文件。

会上，何传添代表海丝中心做 2016 年工作汇报。他指出，中心形成并完善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围绕海丝沿线国家与区域国别研究等六大问题，构建了五大跨单位创新团队开展协同研究，开展“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理论、决策和实践问题研究，成功举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相关成果获国家有关领导重视、肯定；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平台，举办沿线国家青年领袖培训班，实施“小语种服务大战略”计划，打造“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联合培养等。

新闻快讯

我院召开 2017 年新学期工作布置会

3月3日下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召开2017年新学期工作布置会，全体人员参加，会议由刘继森副秘书长主持。



会议现场

刘继森副秘书长代表李青秘书长分别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合作和协同创新方面对战略研究院新一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在科学研究方面，研究院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全球价值链研究以及欧洲研究方面，同时也将重点关注“一带一路”研究，构建海丝智库网络。

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先将基于欧洲研究中心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进行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和优秀导师引进；其次在“广晟”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的方面，将与企业协商，进一步照顾到企业的感受；最后，研究院将加强人才的引进，欢迎各界高水平、符合要求的人才的加入。

社会服务也将作为研究院今年工作的重点，战略研究院将进一步完善研究院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并将数据库向全校以及广州部分开放。海丝协同创新中心将持续开展工作，为申报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而努力。

随后研究院其他部门负责人分别做工作布置。

广东智库联盟工作总结大会在我校举行

3月26日，2016年度广东智库联盟工作总结与经验交流大会在我校国际会议厅召开。本次会议由广东智库联盟主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承办。我校科研处处长、智库联盟轮值单位秘书长陈彦辉主持会议。



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赵细康发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细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杨广生，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旭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李石勇，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邹新月，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梁士伦，2016年智库联盟轮值理事长、我校副校长阳爱民等人出席本次会议。

袁旭阳首先作经验介绍。他提到中山大学依靠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发挥高端智库的外脑和参谋作用。秉承“聚焦港澳，服

务国家”的宗旨，近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发言中他对推进高校智库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他认为要处理好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关系，智库研究要做到“接地气”“联天线”。最后他建议要把中国思想融会贯通让智库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李石勇细数了华南理工大学智库建设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他寄望华南理工大学能帮忙“搭台子”“创环境”“出政策”，加大对相关教师的培训，培育智库研究团队。他指出智库建设是实现理工科文科跨越式发展的一种途径选择，希望通过智库建设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提升相关学科水平。他呼吁更多的同仁关注华南理工大学 IPP 官方微信平台，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探讨。

梁士伦作了经验报告，他介绍了中山市经济研究院建立的背景，同时也赞赏了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的智库建设。他提出了智库建设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专”与“国”，“内”与“外”，“虚”与“实”的关系。

刘继森介绍了我校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发展，认为智库研究要紧扣国家重大现实的需求。他对比了西方智库和我国的智库，认为我国智库要从“参与”实现到“引领”的角色蜕变。

作为 2016 年智库联盟轮值理事长，阳爱民作了工作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各位同行的到来，并对过去的一年作了精彩的总结，特别提到了“智库深圳行”是 2016 智库发展的一大亮点，同时他展望智库未来的发展，希望工作越做越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工作总结

会议审议通过广东财经大学为新一届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赵细康、阳爱民、邹新月三人在智库联盟成员的注视中完成了联盟轮值理事会单位交接仪式。



授旗交接仪式

邹新月作为 2017 年智库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负责人表达了“感谢，学习，努力”的六字发言。他感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对广东财经大学的信任，提出 2017 年智库的建设要向广外学习，努力作做几件实事。

在自由交流环节上，张其学、谭苑芳、杨公齐三人各抒己见，对智库建设提出了自己宝贵的意见。

赵细康总结发言，感谢广外在 2016 年对智库联盟建设的付出，同时感谢广东财经大学承接了 2017 智库联盟的工作。他指出广东省智库建设“起步早”“前景好”，对智库的未来满怀希望。

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刘继森副秘书长现场讲解。



参观研究院

二、学术动态

专家声音

周方银：澳对华态度转变是理性选择

本文原载于《环球日报》2017年2月10日，全文如下：

链接网址：<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7-02/10099453.html>

王毅外长日前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期间，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称澳大利亚将继续做中国值得信赖的伙伴，中澳关系“稳如磐石”。联系到毕晓普过去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她对中澳关系的这一评价让人有些感到意外。这似乎预示当前中澳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

近几年来，美国在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加大了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力度，美澳同盟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和提升。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对美国的支持在美国的地区盟国中颇为突出。与美国的其他盟国和地区伙伴相比，澳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的支持颇为坚定和积极。作为一个在南海并无直接重要利益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相关政策立场颇引人注目。相形之下，中澳关系的发展则出现一定波折。虽然中澳经贸关系依然紧密，但澳国内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在过去两年有所高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澳大利亚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本来还可以按这个剧本继续演一段时间。

客观上，澳大利亚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视美澳同盟为其实现政治、安全利益的基石，同时在经济上更多地与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总体符合其利益的政策选择。而且，澳大利亚远没有达到需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地步。维持澳美关系、澳中关系一定程度的平衡，不过深地卷入与自身关系不是特别大的大国竞争，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下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政策独立性，是符合其长期利益的做法。对此，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不可能不清楚。

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在南海等问题上显得有些突出的做法，不完全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国际秩序变动的担心。澳大利亚总体上不希望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与地区秩序发生大的改变，甚至有时对美国表现出某种“忠心护主”的态度，这至少是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士的心态。

正是基于这一心态，澳大利亚在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政策时，并不期望从美国得到较大的物质回报，但希望获得美国给予积极的心理上的肯定，至少是有一些表面上的肯定。

但1月底特朗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通电话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它在媒体上的广泛报道，显然打破了澳大利亚人这一默认的心理预期。它向澳大利亚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总统看重的是实际利益，而不是澳大利亚人的心理感受。如果澳大利亚要向美国表达忠心，唯一有效的方式是持续付出较大的现实代价，对美国的政策进行单方面配合。即使如此，换来的很可能是美国更多的指手画脚，而不是美国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对澳大利亚的实际利益回馈。

这样一种前景，无疑是任何理性政治家都十分不愿看到的。

澳大利亚转圜中澳关系的做法，并不是冲动式的反应，不是针对特朗普的行为而采取的“报复性亲华”。当前，澳大利亚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仅符合其物质利益，还可以利用澳中关系的改善，改善澳大利亚在美国面前的地位，凸显美国在东亚事务的很多领域有求于澳大利亚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有其聪明的一面。

但如果仅仅把澳中关系的改善作为澳美关系的一张牌来打，其实还是落了下乘，它还是在澳作为美国小伙伴这一前提下的行为。对澳大利亚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更有效地维护其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利益，如何更好地在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获得本地区国家的更大认可。从这个意义上，保持澳中关系的稳定性，实现澳中关系的良好发展，实际是一种更加立于不败之地的选择。

（作者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周方银：当前西方国家思潮的演变趋势与深层动因

本文原载于《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7年02期，全文如下：

2016年国际政治中连续出现多起黑天鹅事件，特别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心理震撼。此外，法国、意大利的政治也在酝酿重要变化。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绝非偶然，它们一方面是西方各种思潮演化的结果，同时也会为西方思潮的进一步演化推波助澜，并对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反精英主义泛起，民粹主义形成气候

民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特点是高度的平民化取向，强调尊重平民的价值和理想，认为政治合法性从根本上存在于人民的意志之中，并反对精英主义，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把普通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力量。平民化是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

民粹主义的优点是关注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无疑具有了新的特殊力量。但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它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服从，即使这种意愿是非常短视和极度狭隘的。由于民众意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为政治人物操纵民意提供了空间。民粹主义的上升和泛滥，为具有魅力的政治领袖蛊惑人心、操纵民意、宣

扬极端思想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有意操纵之下，由民粹主义所激发出来的政治力量，往往最终导向非普通民众所期望的、有时是颇具悲剧性的结果。

信息化时代社交媒体的迅速兴起，为民意的表达、大众的动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手段。总体上来说，平民的思想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不连贯和具有较大随意性的，他们常常有着颇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从而可以为不同的政治人物所利用。因此，我们在西方国家看到的不是一两个政治人物利用民粹主义的主张崛起而是很多政治人物用不同的民粹主义主张在政治舞台上显露身手。近两年西方国家连续出现的大选和公投，为民粹主义影响现实政治提供了有效的渠道和机会。

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特朗普从最初不被看好，却最终当选美国总统而且包括民主党内开始不被看好的桑德斯，也在党内初选中给希拉里制造了很大麻烦，在全美 50 个州中赢得 23 个州的支持，使希拉里要靠超级代表的支持才能锁定党内提名。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属美国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翼，但他们的竞选都表现出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都是通过聚集草根力量的支持，都提出了一些颇为激进的政策主张，其中部分主张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是具有颠覆性的。特别是特朗普的一些主张如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限制穆斯林的进入，以及他在女性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和说法，直接打破了美国的“政治正确”，遭到很多美国传统精英的极度排斥。但由于他不断获得普通人民的支持，而一次次涉险过关。

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对华尔街、大企业和两党建制派表示出不满甚至愤怒，但他们在引导这一情绪的策略和方向上有很大不同。桑德斯希望他的支持者采取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更多地参与和影响政治来改变社会，他把支持者的不满和愤怒导向富人和大企业，导向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特朗普则将主要矛头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的做法分别体现了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

在调动民众情绪，形成稳定的政治支持方面，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焦虑情绪。在这个方面特朗普的做法从结果来看更为成功。他针对的对象更集中和明确，所使用的措辞也更激烈。特朗普充分利用白人蓝领阶层在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对自身数量和地位下降产生的恐惧、因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快速变迁导致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以及对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力感到的不安。特朗普通过夸大和强化他们的这一情绪，在面临精英团体较大反对和压制的情况下，保持了稳定的支持，并获得最后的胜利。

特朗普和桑德斯实现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在竞选过程中，一贯地保持了对传统政治精英、现有建制的反对态度，这成为他们聚合草根支持的一个核心吸引力。在竞选过程中，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称反对金钱政治，并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额捐款，特朗普则主要依靠自己的资金。两人都坚持反建制派的立场，也都没有获得两党建制派的首肯。通过把自己与传统政治精英严格区分开，他们努力把对精英政治不满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集在一起。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

平民政治对精英政治的胜利，但确实是特朗普在操控平民思想和情绪，并以此产生重要政治结果方面的胜利。

欧洲形势的发展，同样不能让传统政治精英感到安心。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应脱离欧盟进行公投，结果支持脱欧者以51.9%的票数胜出，这一结果，对国际社会造成巨大心理冲击。英国脱欧，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出现重大裂痕，也使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变得黯淡。与此同时，意大利长期没有走出欧债危机的影响，国内主张退出欧元区的“五星运动”发展势头迅猛。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就政府全面改革宪法的计划举行公投，结果以较大差距失败，这加剧了意大利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对欧元区的稳定和存续产生不利影响。2016年12月4日，在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以53.3%对46.7%的优势击败代表极右翼的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成为总统，这个结果，让很多欧洲人松了一口气，如果霍费尔当选，将成为此时欧洲唯一一位极右翼总统，并将在很大程度上提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的士气。

在法国，主张排外、反移民、反对申根协定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影响力迅速上升。2015年12月国民阵线在大区选举的首轮投票中，在13个大区中的6个大区得票领先。2017年4至5月，法国将进行总统大选，最可能出现的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菲永和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对决的局面，而且国民阵线胜选的可能很大。在德国随着难民问题的发酵，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显著上升。2016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持反移民立场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首次进入柏林的州议会。2016年12月20日，德国右翼政

党 Pegida（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在德累斯顿召集了超过 50 万人参加的集会，对默克尔的移民政策表示反对。为了在 2017 年的大选中获胜，默克尔 12 月 6 日在演讲中表示“将不会允许难民大量涌入的情况再度发生、穆斯林的蒙面黑纱将被禁止、难民必须适应德国文化”。这显然是出于竞选考虑而对右翼主张做出的重要妥协。2016 年 11 月 11 日，波兰的独立日大游行，也成为极右翼势力的盛会。

美国、欧洲局势的这一发展，显示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一股巨大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为任何政治家所不能忽视，并不得不加以十分小心的应对。与民粹主义迅速上升相对应的，是传统政治精英影响力受到的迅速和猛烈的冲击。

从西方政治思潮演化的角度，真正值得人们警醒的，不是民粹主义为何会异军突起，而是传统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滑坡。政治潮流的潮起潮落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现象，其背后则是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因素累积作用的结果。民粹主义的“诱惑”之所以让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难以抵御，主要并不是因为其实际政治主张多么合理、有力、令人信服，而在于连续多年以来，特别是自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精英在解决国家与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时，能力不足、办法不多并缺少担当，由此出现经济发展多年停滞、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融合没有进展、种族矛盾持续发展的局面。

这样一种态势的多年持续，使得民众对于政治领袖兑现其竞选承诺、解决经济社会危机、创造更多就业、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景越来越丧失信心，在民间累积的颇为强劲的不满情绪，并

不能通过几年一度的大选得到有效的释放。由此导致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普遍的失望和幻灭感，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无法克制自身利益上的狭隘性、无法有效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难题，不能把他们从当前的困顿局面中解救出来。美国、欧洲的政治局势，与其说是民粹主义的胜利，不如说是精英政治的失败。

民粹主义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只是一种思想风潮，它会释放出巨大的推动社会变化的颠覆性力量，有时是一种具有冲垮一切政治束缚能量的力量，但它无法提供解决任何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方案。它的力量更在于“破”，而不在于“立”。它提供了一种打破传统政治局限的契机，但如果不能妥善利用，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民粹主义虽然强调平民的作用，但它常常并不能带来平民境遇的改善，它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会把现实政治引向何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另外，民粹主义难以持久，经过一段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仍会回到精英主导的局面，区别仅在于换成了另外一拨精英。

保护主义回潮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退潮

自 1991 年冷战结束以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自由主义在西方占据了道德高地，并在全球成为深入人心的普世价值。但随着西方国家开始成为民粹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西方国家作为自由主义的灯塔变得黯淡下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也出现比较大的动摇。

保护主义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深厚历史和实践的思想，它在维护某一国家的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很容易因其他国家报复性的反应而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在现代国际秩序

中，它不再是一种为人们所认可和提倡的做法。但在民粹主义情绪迅速上升，西方国家承受经济不景气的多年压力的背景之下，保护主义又有了较大规模泛起的政治社会土壤，并对国与国关系产生日益增大的影响。

保护主义更经常地表现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经济缓慢增长的大环境下，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些国家从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考虑出发，采取了更多保护本国工业和贸易的措施。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行，贸易保护主义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当前的贸易保护越来越多地采用非关税措施，并衍生出很多十分隐蔽的手段，包括大规模和无休止地实行反倾销措施、任意实行出口补贴政策、制定单方面的进口技术标准、实施名目繁多的法律规定，等等。依靠这些手段，贸易保护可以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大行其道，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对付。总体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贸易保护主义最重要的受害者。欧盟、美国不肯履行过去的承诺如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就是为了可以继续对中国随意采取反倾销措施，更好地保护本国工业。

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特朗普于2016年11月21日表示，他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发布总统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还多次表示有意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即使曾经支持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也对TPP持否定立场。在大选过程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在TPP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无疑是因为这样的立场更能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因为对自由贸易的敌视态度有助于赢得选票。

此外，特朗普于 2016 年 12 月 4 日接连发出 6 条推文，警告美国公司“如果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那将犯下代价非常昂贵的错误”。他说，那些将工厂从美国搬迁至外国、解雇美国员工，然后再把产品卖回到美国的企业，不要妄想不受惩罚或不承担后果。这些说法背后传递的信息，已经远不是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简单。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奔驰、宝马、菲亚特、通用、福特等公司都受到特朗普以不同方式发出的警告和威胁，这对他们下一步的投资方向无疑将产生较大影响。

反对自由贸易，强调各种产品的本国制造，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冲击，是保护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其背后是一种共同思想和情绪，就是本国第一、自我利益第一，并且试图通过一种狭隘的、不包容的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而不是通过互惠的方式，在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同步实现更多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战后，国际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建立起一个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位于这个秩序的顶端，其他国家则以同盟、伙伴和受保护国等不同形式安排在美国之下。这个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以自由主义关系的普遍性为标志。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重要的支持者和维护者，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这一秩序的建立者。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是强国加于弱国的结果。国际秩序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强制实施的结果“只有在强制实施这一秩序的国家拥有捍卫它的能力的情况下，这种秩序才能维持下去”。

当前，美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能力、意愿和公信力都

出现了较大下降。特朗普的上台，显著加大了美国转向自我保护的力度，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的冲击，特别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理念基础形成很大冲击，这对未来国际社会的演化方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将大于任何单一事件，因为它代表的是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及与他国互动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不断产生政策层面的后果。如果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思路不发生改变，未来国际政治的逻辑将在一定程度上退化到更少受国际规则制约的权力政治状态。

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积和爆发

全球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各国联系日益密切，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提升的一种现象和过程。全球化的重点在于它是一个过程和趋势，在宏观上指的是人类通过长期的交往和交流互动，逐步实现交融，进而产生全球认同，组成全球社会的一种过程和趋势。全球化不仅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居于核心位置。经济全球化通常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以统一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规则为标志，来促进全球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取得了迅速发展，它也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个时期的繁荣。全球化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一系列去监管化的政策的退出具有比较直接的联系。1994年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自由化协定的达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欧洲就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做出的重大努力，都是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由此推动了全球生

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的扩张，带动了发达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对人类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深入发展，也带来了与之相伴随的一些问题。包括国家之间发展速度的不均衡，在很多国家出现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越来越大的落差，人员国际流动的增多造成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种族、文化的融合问题，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冲击，等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的提升速度，全球化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但也造成很多问题它制造问题的速度，明显快于国际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走向全球化的反面，从而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提供重要的原动力。

从总量上来说，全球化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积极的利益，但这个利益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它并不是让所有人受益，而是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全球化进程逆转的根本推动力。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全球的消费者受益，但使不少国家的生产者受损；国外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可能导致本国很多工人的失业；金融全球化使得中下层民众的财富在金融危机来临时面临更大的风险；人员的自由流动加大了外来人口对本地人口的冲击，并引发一定的社会、宗教、文化问题。与之相比，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组织生产，并使用各种精巧的手段来避免国家的约束，逃避巨额税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在缓慢地集

聚，其来源多样，诉求各不相同，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会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能量。有意味的是，最终引爆反全球化民粹运动的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还认为自己丧失了在国内政治层面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

对全球化表示反对的人们，会以多种方式来表达其政策诉求。很多美国人希望把更多就业留在本国，支持特朗普在美墨边境修筑高墙，以便更好地把墨西哥人隔离在国境之外，一些欧洲人把本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归咎于移民，从而对多年以来代表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形成猛烈冲击。英国首相特里萨·梅在保守党大会上则公然表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那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由于全球化一直有其受益者和利益受损者，因此反全球化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存在，但过去它一直只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声音，对这些声音，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忽视态度。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日益形成政治气候，保护主义进一步回潮，反全球化的声音也变得更加高涨，其中的很多主张逐渐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选项。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的减弱”。换句话说，在选票政治的压力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已经很难通过对全球化的大力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反而从中看到很大的政治风险。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德国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激烈反对、TPP在美国民众中不受欢迎，对很多西方政治精英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反全球化的力量会在某些领域胜过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从而导致全球化进程一定程度的后退。

西方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

分离主义曾经是一个给很多非西方国家带来苦恼的问题，但在当前，不少西方国家也受到分离主义的较大冲击。分离主义的目标是从现存主权国家中分离出一部分领土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其核心动力一般来自该国内部的某少数民族群或某一地域势力，它建立在很强的族群认同或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其进程往往受到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重要影响。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400万常住居民举行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将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投票结果，支持统一派以55%对45%的比例战胜独立派，从而避免了英国的分裂。除了英国的苏格兰之外，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比利时的弗拉芒都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分离主义活动，其中，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在西班牙中央政府反对的情况下，于2014年11月9日举办了不具法律效力的独立公投，参与投票的加泰罗尼亚居民中有八成赞成独立。此外，还有西班牙的巴斯克、英国的北爱尔兰等持续时间很长并令有关国家颇为头痛的分离主义活动。

虽然这些独立运动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但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欧洲国家分离主义躁动情绪的上升，这对欧洲的政治精英是一个重要的警讯。特别是，如果上述任何一个分离活动取得成功，将会对其他分离活动产生重大鼓舞，从而会引发连锁反应。

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苏格兰独立倾向增强的同时，主导独立公投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公投过程中并没有大谈民族问题，反而在努力淡化其民族主义色彩，而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民主和民生问题上。苏格兰一家民调机构在公投前做的民调显示，在22个最贫困的居民区，47%的受访者准备投票赞同独立，而在22

个最富裕的居民区，只有 26% 的人准备投票赞同独立。显然，苏格兰独立要求背后不完全是民族主义因素在起作用。经济利益考虑对其独立倾向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更应令人感到担忧的问题，对很多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是在这一地区就会在另一地区存在的问题。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来说，分离主义未来将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挑战，但到目前为止好的一面是，这一运动总体上是以和平的方式，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与之相比，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造成的挑战，无疑更为血腥和残酷。

在人们的心目中，过去的欧洲总体上是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宁的地方，但近两年却频频发生恐袭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欧洲的印象。2015 年 1 月，三个与也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在《查理周刊》编辑部门口射杀了 12 人。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发生系列枪击和炸弹事件。2016 年 3 月 22 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个靠近欧盟总部的地铁站发生爆炸。此外，德国也陆续发生砍人事件（2016 年 7 月 18 日）、慕尼黑枪击事件（2016 年 7 月 22 日）。2016 年圣诞节前夕（12 月 19 日），欧洲更是出现一日三次恐袭的情况。在大西洋对岸，美国的反恐形势也不容乐观。2013 年 4 月 15 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线附近发生两起爆炸。2015 年 12 月 2 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发生枪击事件。2016 年 6 月 12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家同性恋夜店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自 2001 年“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恐怖袭击的防范和打击力度，但 2015 年以来，恐袭事件发生频率在西方国家显著上升，且没有表现出最高点已经过去的态势。

恐怖袭击的频率和烈度出现引人注目的上升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西方国家外来移民增多，他们因语言、文化、种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效融入西方社会。在融入之前，他们容易受到当地社会的疏离和排斥，这一方面加大了其融入的难度，也使其对社会产生失望和不满。其次，是西方国家社会凝聚力下降，社会对立上升的结果。全球化的发展和产业转移，造成西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重要分化，使一部分西方国家原来的中产阶级沦为“第一、第二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加大了原有人口对外来者的不满。社会中辛勤劳动的中产阶级对高社会福利安排的享受者也存在不满。女权主义、同性恋者地位的提升，导致社会价值的重新排序，让一部分人欢呼，让另一部分人感到失意。第三，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复苏乏力，使西方国家政府缺乏有力的手段去解决社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和问题，而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一些无助于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虚假议题上，这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失落和危机感。可以说，充斥于西方社会的，来自于不同根源、不同群体的不同形式的不满甚至怨恨情绪，是造成西方社会出现不稳定并导致独狼式恐袭增多的根源。相比之下，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极端思想更容易在社会上传播，西方政府在防范和打击恐袭方面手段的不足，则主要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利的一面在于，一些负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可能产生相互强化的效应：恐怖袭击的上升，导致民众更加缺乏安全感，并强化他们对外来人口、其他族群的怀疑和猜忌，这会使后者产生更大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社会对立的加剧，也使政府很难对外来者实施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政策。政治对

立的发展、集体认同的弱化、社会情绪的割裂、强调自我利益的心态，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使政府更加缺少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这样的循环一旦开启，在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内都很难打破。

结语

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总体复苏乏力，由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和引发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未能获得有效解决，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不同问题的涌现和叠加，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思潮的转向。西方国家政府多年未能有效应对社会经济挑战的实际表现，加深了民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为民粹主义的泛起提供了政治土壤。一些西方国家更多地转向保护主义的政策，对于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态度消极，甚至不惜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这使过去运转相对有效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二十多年以来最大的挑战。逆全球化思想的累积和爆发，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全球治理形成很大的冲击。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的发展，让人们对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很难乐观。

西方政治思潮的演变，既是国际政治现象发展的结果，同时它也会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在深入把握西方国际思潮变化方向的基础上，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挑战加以积极地应对，有效地避免其不利方面。（注释略）

王璐瑶：特朗普时代的中美 BIT 谈判何去何从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2017年2月27日，全文如下：

链接网址：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7925

澎湃
THE PAPER

精选 视频 时事 财经 思想 生活 问吧 订阅

王璐瑶/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2017-02-27 15:58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过度坚持及保护主义策略，在强化外界对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立场和底线认知的同时，也会使得美国陷入被动处境。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前曾放言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让外界对可能爆发的中美贸易战的关注度急剧升温。那么，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又将何去何从？

特朗普上任伊始即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重谈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称将通过双边谈判的形式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并服务于“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典型的美国保守派的价值主张。相较于奥巴马方面的实质性战略转向，特朗普将经济协定谈判的重心从多边转移至双边，在给双边谈判带来更多动力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多期待和压力。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任前曾放言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让外界对可能爆发的中美贸易战的关注度急剧升温。那么，在国际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又将何去何从？

特朗普上任伊始即宣布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重谈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还称将通过双边谈判的形式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并服务于“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典型的美国保守派的价值主张。相较于奥巴马方面的实质性战略转向，特朗普将经济协定谈判的重心从多边转移至双边，在给双边谈判带来更多动力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多期待和压力。

截止目前，中美两国已在 2016 年底于华盛顿完成第 31 轮磋商，并交换第 3 次负面清单改进出价，形势焦灼。美方不仅在代表市场开放度的负面清单领域颇有怨言，其国内还有声音认为，在 BIT 谈判过程中，美国不应再将如今实力强大的中国继续作为发展中国家看待而过多妥协，反而需要借助 BIT 谈判，促进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并降低投资准入门槛；同时推进“竞争中立”规则，以限制中国国有企业凭借国家补贴和政策扶持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的优势。

与此同时，美方也十分看重对规则主导权的维护。正如特朗普方面并非完全反对国际贸易而是寄望于重新建立所谓符合美国利益的公平贸易规则，美方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逻辑也是如此。国际制度是国家权力的附属现象，因而美国此前力推 2012 BIT 谈判模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旨在维护自身提供治理规则作为公共品的既有垄断优势，进而通过主导议题设置和标准构建，来为中国增设门槛。这尤其表现在中美 BIT 谈判中美方极力强调“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等美式规则方面。

理论上，外资流入（FDI）可能带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符合特朗普任上目标。外资流入对东道国就业的

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即 FDI 企业通过新建项目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及主要与 FDI 企业贸易活动有关的“间接效应”，例如进口活动可能使部分本土企业产品被替代，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而企业裁员，出口活动则可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使得业内企业增加雇员。

近年来中企对美投资持续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displays，2015 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历史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首次超过同期外资流入水平从而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同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亦再创新高，同比增长 5.7% 至 80.3 亿美元，且境外企业雇佣美国当地员工 8 万多人。特朗普所看重的制造业以 40.1 亿美元高居榜首，同比增长 122.2%，占 2015 年中企对美投资全部流量的 49.9%。此外，美国还是中企对外并购的第一大目标国，仅 2015 年中国企业对美实施并购案就达到 97 个，上海复星国际、安邦保险、万达集团、海航集团等发起的并购项目均在其中。

但是，中国对美投资相对规模仍然有限且易受东道国政策影响。从占比看，2015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仅占中国全部对外投资的 5.5% 和 3.7%，与两国经济地位甚不匹配。并且，中国企业屡屡遭遇来自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困扰。美国对外资的审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依据美国规制外资跨国并购、保护国家 安全的基本法《埃克森-弗罗里奥法案》（1988 年）进行审查；二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分别依据“国家工业安全项目”与“关键行业”条款对外资进行审查；三是成立美国战略物资保护委员会以约束其他类型的投资交易，该机构至少每两年一次，就涉及国家安全

的关键物资进行评估并向国会报告。

在美国三位一体的外资审查体系中，CFIUS 属于跨部委机构，其审查范围通常包括评估相关投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国防工业、相关科技与资源、通讯与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国土安全等。其中，“外国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美国的某一公司或产业”这一审查情形通常被视为特别针对外国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发起的对美并购案。CFIUS 最新报告显示，2012-2014 年，CFIUS 就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展开的并购审查案达到 68 项，约占同期 CFIUS 对全球企业对美投资发起的审查案的五分之一。33 项位于制造业，其余主要位于采矿、建筑、金融、信息等行业。仅 2014 年中国企业遭遇的 CFIUS 审查案就高达 24 起，位列国别排行榜首位。这与中国对美投资的较小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从历史趋势看，美方还会继续坚持以“国家安全”为审查为核心的外资监管体系。通过对美国历任行政当局的外资政策梳理，可以看到，美国经历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投资自由化”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卡特方面的“中立立场”，再到里根方面以来开放市场与外资监管并重的转变历程。

美国外资监管框架的建立与完善是个案推动与外部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外资审查的核心条款《埃克森-弗罗里奥法案》及此后对其加以拓展完善而形成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2007 年）与美国先后经历的日本投资潮和新兴经济体投资潮密切相关。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利益相关体的外资流入展开更为严格的监管。如今，延续外资监管势头并重视外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也同样符合特朗普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如此看来，特朗普方面对待中美 BIT 谈判的心态应当是颇为

复杂的。一方面，中美 BIT 谈判是两国就双边投资问题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是大幅推进双边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市场，进而在中国对外投资急速增长期内分享更多成果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特朗普方面也会对缔结一项能够显著增强中国投资权力的协定心存顾虑，因而可能会更加强调平等互惠和对等开放，在推进负面清单和涉及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规则时更为强势。

然而，特朗普方面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和中国的选择。美国自里根执政以来，除克林顿外的国家首脑均在任期内发布了积极友好的外资政策声明，在加强外资监管的同时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即使是没有发表外资政策声明的克林顿方面，其在任期内联合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试图建立的外资监管框架也包含了消除资本自由流通的障碍性因素等促进外资流动的措施。特朗普对“美国优先”的过度坚持及保护主义策略，在强化外界对新一届美国行政当局立场和底线认知的同时，也会使得美国陷入被动处境。

作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双边制度安排，中美 BIT 谈判无疑有着强烈的信号释放作用。换句话说，无条件的“美国优先”不仅会影响中美 BIT 的谈判进度，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是否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战略选择。特朗普上任前后以及最终宣布退出 TPP 时各国的反应可对此进行印证。迄今为止，众多国家开始转向中国以寻求与亚太市场更加深入的联结。加拿大等国家开启与中国的双边经贸谈判之旅，其他数个 TPP 成员国表态愿意考虑加入或加速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以期早日达成协定。

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如今在国际经济协定谈判中存在更多选项，自然在中美 BIT 谈判中也拥有更多底气。

从时间轴看，中国经济权力的对外塑造，正在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转变，从早期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国内发展，到如今强调公共品供给能力和包容性发展转变，因而在协定谈判和规则构建方面也会更加主动。一方面是在接轨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新规则方面显示谈判诚意，如在中美 BIT 谈判中承诺引入负面清单模式，并在多个地方省市设置试验区，进行改革探索；另一方面，则是积极推出规则和设定标准，这从 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发布全球首个投资指导原则可见一斑。具体到中美 BIT 谈判，中国应将此作为重新定义中美在投资领域利益和共识的契机，并借此明确中国在双边和国际投资领域的利益诉求和治理路径。

从空间轴看，中国正在迅速推进自贸区（FTA）战略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力求最终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 FTA 网络。新一代的 FTA 谈判通常涉及投资规则，谈判重点也逐渐从贸易领域向投资领域转移，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内措施”转移，并涉及竞争和供应链等新型议题。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美 BIT 是中美 FTA 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完善全球 FTA 战略的重要环节。从策略上看，中国同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协定谈判，如中欧 BIT 和中加 FTA 谈判等，都将产生一定的“竞争性自由化”效应，有利于中美 BIT 谈判推进。

云山沙龙

著名教授论坛第 322 期暨云山学术沙龙第 168 期

阎学通开讲国际秩序变化趋势

3月26日晚，由人事处主办、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承办的第322期著名教授论坛暨云山学术沙龙第168期顺利召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我校南校区B8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的讲座。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教授、陈寒溪教授，法学院副院长王树春教授、欧洲中心师生参加了此次论坛。



阎学通教授首先就国际秩序三个构成要素：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制度安排展开了讲解，其中，他用三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对体系和秩序的区分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对当前国际秩序的

变化进行了分析,并表示:当前挑战国际秩序的是秩序的建设者,而不是该秩序中对秩序不满的挑战者。他通过分析自由主义价值观下形成的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运用主权与人权之争的例子,以及时下“英国脱欧”“特朗普赢得大选”等热点事例,说明当前反建制主义的思潮对自由主义的强烈冲击。

关于中国与当前国际秩序,他就道义现实主义展开讨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快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究其原因,是中国进取型的政府领导,让改革力度大,这使得国际将维护国际秩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内部,从国际秩序的三要素来考虑,这些都超出中国改革和维护的能力之外。

论坛设有提问环节,在场学生积极举手提问,阎学通教授就提问者所提出的围绕着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等方面,如“中美关系问题”、“道义现实主义在东亚的意义”等问题作出了回答,现场讨论气氛热烈,在场师生掌声不断。

阎学通教授简介:

阎学通,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国际政治科学》总编、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总编、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理事、中美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理事、中国亚太学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兼职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东南亚研究》、《当代世界》、韩国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美国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杂志的学术委员。

一个国家，两种视角：印度地方对于“一带一路”的需求

2017年1月10日，印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叶文访问战略研究院，并与研究员就“印度地方对于一带一路的需求与看法”进行交流。交流会由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主持。



叶文介绍了印度各邦的基本情况，说明印度主要邦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态度。他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如能加快实施，可以大幅改善印度乃至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增加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他强调，从印度地方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的选择，而非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妥善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不仅对于印度有促进作用，也能对中国有利。但是中国需要开始从地方层面推动“一带一路”，而非仅仅关注与中央政府搞好关系。



叶文分析了目前“一带一路”项目推进的难点。一，印度近年的政治、经济改革，给了地方更大的权限制定符合当地情况的税收、财政政策。如果中国过度关注与印度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忽略与印度地方的互相了解，那么一带一路的推进将面临困难。二，中印两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不能仅仅关注政治层面的交往，而应上升到一种“全面外交”（Comprehensive Diplomacy）的层面，即更关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更关注次优选择，更关注印度地方及区域的需求。

与会者就治理模式、印中孟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国和日本在印度投资的对比、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等方面展开讨论。

高教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光教授、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陈寒溪教授、部分研究员参加交流会。

新时期两岸经贸关系的现状、问题和走向

2017年3月6日下午，韩永辉博士结合3个月的赴台访学经历，为广外师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曾楚宏教授主持。

首先，韩永辉博士介绍了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及历史渊源，分析了台湾的选举状况和党派分布，他指出，当前岛内形势与台湾的人口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接着，韩博士介绍了台湾的经济状况，台湾存在经济活力僵化的问题，尤其是在电子支付、互联网行业的滞后，但是产业也有着其固有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注重产品质量，精细化程度上。台湾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省份，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大陆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台湾的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占据重要位置。同时，韩博士还介绍了台湾的交通和高等教育情况。最后，韩博士建议加强两岸的经贸与文化交融路径，促进两岸认同。



跨国公司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7年3月7日下午，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客座教授史蒂文·尼古拉斯（Stephen Nicholas）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304会议室做了题为“跨国公司国际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学术报告。

尼古拉斯教授首先从大方向入手，讲述了当前的国际政治大环境，西方国际自由秩序的重建，以及美国新总统上任可能会带来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结合美国关于工作岗位提供者的传统制造业和未来工业之间的冲突，美国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在保险业和外资企业方面的市场，以及中国国有企业通过对美投资来获得外国的技术等事件，分析了跨国企业以及跨国贸易的未来发展。



川普联俄制华战略中的“文明”问题

2017年3月8日，云山学术沙龙第164期在国际战略研究院304会议室举行。本期学术沙龙主讲嘉宾是美国Wittenberg大学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于滨，主题为“川普联俄制华战略中的‘文明’问题”。讲座由中国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主持。副秘书长陈寒溪、研究院研究员及师生参加讲座。

于滨教授以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的“亲近”关系为本期主题的切入点，通过大量的图片展示和数据分析，深入浅出地分析并提出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白种人的理论这一核心论点，从而揭示了美国和俄国之间密切关系源于同属“白种人”原因。主题讲座结束后于滨教授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讨论，现场师生踊跃发言提问、积极与于滨教授互动，并就大家关心的中美国际关系走向问题、中俄之间伙伴关系由来以及未来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云山学术沙龙162期：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

3月13日，印度辨喜基金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布里格·阿纳得（Brig Vinod Anand）来访战略研究院并作题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地位”的讲座。讲座由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主持。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寒溪、战略研究院相关研究员出席了讲座。

阿纳得从不同层面介绍印度在印度洋地区（Indian Ocean Region）的战略地位，以及印度洋地区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对于印度而言，有2/3的海上贸易需经过印度洋，40%的海上原油生产依赖印度洋。此外，印度属于海洋经济，其80%的原油需要通过海上运输，而且印度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也需要依靠海洋经济。本届莫迪政府希望能促进、维系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增长，并提出 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战略。



中国当前外交的几点思考

2017年3月23日上午，外交部高级访问研究员、原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公使衔参赞任仕在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304会议室做了题为“中国当前外交的几点思考”的学术报告。讲座由《战略决策研究》执行主编、中国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主持，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及部分师生参加沙龙。

任仕从中国当前外交形势入手，分析了当前国际体系、中国的外交策略，对中国西北周边外交、亚洲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讲座最后，他就上合组织、周边外交、调研报告撰写等与在场人员进行交流。

三、社会回音

全球智库排名发布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位列亚洲大国智库第89位

2017年1月25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报告《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国北京发布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中国中心举办。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入选其分项表单亚洲大国智库排名前90位。

北京发布会是该报告全球系列发布活动之一，也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首发。该报告分别于美国华盛顿战略、纽约等全球60多个国家、86个城市同时发布，是国际上一年一度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智库报告。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跻身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第89位

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共列出52个分项表单。中国社会智库在多个分项表中表现亮眼。



2016 全球权威智库排行发布现场

其中,《全球智库报告 2016》发布的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 90 强榜单中共有 18 家中国智库上榜,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4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8 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 10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13 名)、卡耐基中国中心(第 19 名)、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第 20 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22 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 24 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第 30 名)、上海社会科学院(第 35 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第 41 名)、财团法人国策研究院(台湾)(第 45 名)、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第 48 名)、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第 51 名)、盘古智库(第 57 名)、新华社瞭望智库(第 59 名)、团结香港基金(第 60 名)、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GIIS)(第 89 名)。

报告简介：

《全球智库报告 2016》是由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领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连续第十年为全球智库进行综合评价的权威报告。该报告项目十年来建立了一套客观公正的研究体系，通过每年对全球智库进行综合排名，实现研究全球各国智库在政府与社会中的作用，描绘出全球智库发展的主线图，倡导智库为搭起社会与政府间的桥梁付出努力。其全球智库排名也因评选过程的广泛参与度和过程设计严谨、公正成为当今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排名体系，因此《全球智库报告》也被誉为“智库中的智库”。今年报告认为“在这十年中，全球智库共同体正在逐步确立，为应对国际新环境群策群力。”

2016 全球智库排名的方法介绍：

今年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6》全球智库报告向全世界 6846 家智库发送了智库提名的邀请，评分标准参考超过 4750 名新闻记者、政策制定者、公共或私人捐助人、以及各类区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最终评选出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的 175 强。在智库排名评价流程中，《全球智库报告》向这些同行及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由他们推荐入选，并针对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拥有卓越贡献的智库开展平评估排名工作。

2016 年全球智库指数（GGTTI）提名和排名标准包括智库领导层的才能和责任感；智库员工的质量和声望；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研究员的能力；学术表现和声望；出版物的质量、数量及受众范围；智库的总体成果；网站和

数字平台的展现；媒体声誉和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等近 30 项评估标准。《全球智库报告 2016》并不将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方法，而是考虑了资源指标、利用率指标、成果指标、影响力指标等。

《全球智库报告 2016》下载链接：

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

四、外出交流

刘继森赴京参加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 2017

2017年1月9日，我院副秘书长刘继森教授受邀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和“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主办，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 2017，并在下午的分论坛上作发言。



周方银主讲“2017 全球战略论坛”第二讲

谈太平洋岛国与一带一路战略

2017年2月22日,我院周方银教授应邀参加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2017 全球战略论坛”第二讲,并担任主讲,题目是“太平洋岛国与一带一路战略”。

周方银教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太平洋岛国在外交布局中的战略价值,指出了这些国家在经济结构、自然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美日印等大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强国在该区域内的竞争、博弈与合作,对中国在这一地区软实力和硬实力提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讲座由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政治研究室、周边战略研究室共同举办,王荣军副院长主持。



◆ 外交部亚洲司会议

2017年1月10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秘书长陈寒溪参加外交部亚洲司会议。

◆ 澜沧江-湄公河六国智库论坛

2017年1月12-16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卫华赴南宁参加澜沧江-湄公河六国智库论坛。

◆ 广东省高等学校2016国际交流合作暨港澳台事务年度工作会议

2017年1月12日-13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教授参加广东省高等学校2016国际交流合作暨港澳台事务年度工作会议。

◆ 外交部双月会议

2017年3月14-15日，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副秘书长陈寒溪参加外交部双月会议。

五、成果发布

海丝中心核心协同单位在京发布《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

近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核心协同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东南亚蓝皮书：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来自中央部委有关部门、在京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厦门大学等官员和学者，以及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出席了发布会。

由海丝中心核心协同单位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建设项目的最终成果。该报告以年度东南亚地区发展为主题，跟踪各国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发展态势，对东南亚地区近期和中期发展进行分析与预测，从而为我国的外交战略和周边策略提供决策依据。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勤教授代表课题组介绍了该发展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对策建议，与会的专家学者作了发言。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基本保持了政局稳定，经济中速增长，区域化进程加快。2016年，东南亚政坛引人关注的是1月越共十二大召开及其中央人事调整、5月菲律宾的总统选举和10月泰国国王逝世后的政局动向等。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

2016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速普遍减缓，多数国家保持了中速经济增长，少数国家则低速增长，但中期的增长前景仍不明朗。2015年底，东盟正式宣布东盟共同体建成。伴随东盟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东南亚区域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已初具规模，区域政治发展和安全合作取得进展，区域社会文化建设成效明显。东盟制定了2025年东盟三大共同体的发展蓝图，为未来十年东盟共同体建设制定了远景规划。一年来，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了新进展，一些框架协议得以落实。例如，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议、东盟贸易便利化协定、东盟食品安全规则、东盟关税查询系统、东盟开放天空协议等。不过，由于东盟成员国政治制度多样、发展阶段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加上内部合作和协调机制不完善，均制约了区域性制度安排的实际效应，未来东盟共同体的发展仍任重道远。

东南亚国家多以平衡外交为主，推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并将发展东盟国家之间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基石，东盟内部总体保持了稳定与团结。东南亚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点地区，2015年11月美国与东盟双方关系提升到了战略伙伴层面。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的东南亚战略将引人关注。当前，日本高度关注东南亚，日本希望拉拢东南亚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有共同对华的步调，在未来构建亚太政治安全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同时，东南亚的市场潜力对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东南亚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从东盟共同体蓝图看，它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许多契合点，可逐步进行战略对接。东盟共同体与“一带

一路”均将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作为三大支柱，其战略规划、合作重点、产能合作和人文交流等措施有着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伴随着东盟经济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东盟在“一带一路”的地位与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它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互联互通建设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新华网、中新网、人民网、国际在线、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新闻媒体均对该发布会进行了报道。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 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暨专题研讨会2月24日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93家智库和研究机构代表200余人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以下简称“智库联盟”）理事会共同理事长郭业洲，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智库联盟理事会共同理事长焦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智库联盟理事会共同理事长魏建国出席会议并致辞。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金鑫主持会议。



郭业洲在致辞中指出，智库联盟成立两年来，在理事单位的共同努力下，联盟已经形成了拥有 100 多家国内外智库的国际合作网络。智库联盟建设写入了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成为十三五规划中的一个专有名词。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智库联盟龙骨已经搭建、机制正在逐步完善。我们要乘势而为，强大自身，努力打造智库联盟的升级版。这次会议是建设升级版智库联盟的重要开端。在世界乱象纷呈、发展方向迷茫和发展动力缺失的背景下，智库联盟的建设任重而道远。智库联盟今后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从政治引领的高度，发挥智库联盟引导作用。二是从智力支持的角度，提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贡献率。要从全球的高度和历史的角度思考“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思路和路径，为中央决策提供更高水平的智力支持。三是从机制建设的维度，进一步优化运作模式。要加强机制创新，把智库联盟做实做强，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联盟逐步打造成全球涉“一带一路”

研究的高端学术交流、联合研究、咨政建言、聚拢人脉、权威宣介、引导舆论的核心平台，成为国内外标杆性的高端智库联合体。以智库联盟为平台，形成最大的合力，切实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焦扬在致辞中表示，以智库合作联盟为依托，高校为主体的智库研究机构将发挥综合性研究优势，将国内外分散的信息资源系统化。积极突出育人功能，促进人才“走出去”，加强“讲好中国故事”的骨干人才培养。魏建国在致辞中表示，全球智库合作适逢历史最好时期，新型国际智库合作模式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高水平的视野。中国智库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与全球智库共享人类智慧，共谋人类发展。

本次大会上新增聘理事单位 35 家。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总裁、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副主席陈秋途分别代表新增理事单位和副理事长单位发言。

会上邀请商务部综合司巡视员宋立洪、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于丹、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参赞张维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等嘉宾作了大会发言。会议还确定了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国际智库合作网络，以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国际智库合作网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合作网络的牵头智库。在智库联盟的指导和统筹下，由牵头单位负责联系相

关国家主流智库，组织召开相关国际国内研讨会，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

当日，还举行了专题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经验与主要难点、如何打造“一带一路”升级版、如何做实做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作三个分议题进行分组讨论，与会专家为如何推进“一带一路”转型升级积极建言献策、贡献智慧。